

百年暨南

暨南大学港澳研究丛书

转型时期的


香港经济

Hong Kong's Economy
in Transition

冯邦彦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暨南大学港澳研究丛书

暨南大学高水平大学学科组团——应用经济与产业转型升级经费资助

转型时期的
香港经济
Hong Kong's Economy
in Transition

冯邦彦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时期的香港经济/冯邦彦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 12
(暨南大学港澳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668 - 2278 - 9

I. ①转… II. ①冯… III. ①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香港 IV. ①F127.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0245 号

转型时期的香港经济

ZHUANXING SHIQI DE XIANGGANG JINGJI

著者: 冯邦彦

出版人: 徐义雄

责任编辑: 曾鑫华 高婷

责任校对: 周海燕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6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 言

屈指算来，笔者从事香港经济研究，至今已有整整30年了。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生效，香港正式进入回归中国的转型时期。1986年2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Southeast Economic Information Center Limited）正式成立，由杨振汉先生出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1987年3月，杨先生到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招聘研究员，笔者通过了面试。同年9月15日，笔者第一次来到香港，成为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的分析员，开始了对香港经济的研究历程。

这一时期，香港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动荡：1983年3月是香港前途谈判期间，老牌英资怡和集团宣布迁册海外，消息传出仿佛在香港扔下一颗炸弹；1987年10月全球股灾爆发，香港联合交易所史无前例宣布停市四天、香港期货交易所濒临倒闭；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引发香港中银集团被大规模挤提；1990年汇丰银行宣布结构重组、变相迁册海外……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经济事件，成为笔者研究香港经济的最佳材料。笔者追随着这些事件展开研究，查阅了大量报刊、上市公司年报和资料，走访香港经济的各个重要部门及相关的人士和学者，参与了各种研讨会，对香港的了解、认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

1992年，笔者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研究员，1993年7月又调到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秘书处任经济小组秘书。这一期间，笔者有机会参与了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大会、经济专题会议及各种内部讨论，走访了霍英东、李嘉诚、罗康瑞、范徐丽泰、梁振英、方黄吉雯等香港知名人士，聆听了他们对香港经济及其发展前景的分析与看法，从中受益匪浅。在香港工作期间，笔者对香港经济各个方面都展开研究，包括香港经济的发展历程、发展趋势，香港金融、地产、制造业等主要产业，香港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香港的国际联系及与内地的联系等。当时，正值香港步入回归中国的敏感转型时期，我们重点研究了香港的资本结构及其变动趋势，研究了香港的英资、华资财团的投资发展策略。

1994年，笔者从香港调回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并先后担任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2000—2007年）和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05—2008年）。回到内地后，笔者继续展开了对香港经济的后续研究。2002—2005年，笔者先后不下十次到香港利丰集团进行调研，翻阅了利丰的全部数据、文献、珍贵图片甚至档案，采访了集团董事会主席冯国经先生、董事总经理冯国纶先生以及集团的几乎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部分资深员工，参加了他们的地区经理会议。通过调研，笔者对香港经济有了更微观的认识。2007年底，笔者应香港保险业联会的邀请，前后花费约半年时间对香港保险业各相关机构和数十位资深从业前辈展开了大规模的调研。这些调研使笔者对香港金融业的一个分支行业——保险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2003年6月30日，即内地与香港签署CEPA的第二天，广东省常务副省长钟阳胜打电话给笔者，要求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派几位教授到他的办公室，钟省长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有关CEPA签署的背景和精神，要求我们立即展开调研，分析CEPA的实施可能对广东产生的影响及相关对策。受钟省长的委托，我们展开并完成了研究报告——《CEPA对广东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这是广东省第一份关于CEPA对广东经济影响分析与对策的研究报告。稍后，经广东省政府批准，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成为粤港高层联席会议下设机构——“粤港发展策略研究小组”粤方单位成员之一，成为该小组粤方唯一高校学术机构，其他单位成员包括省政府发展计划委员会、省委政研室、省府发展研究中心等。在该小组工作期间，我们参与了粤方单位成员的内部讨论和与港方成员单位中央政策小组的讨论，为粤港高层联席会议作准备。这一时期的经历使笔者对粤港两地的合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从香港回到内地后至今，笔者相继撰写出版了《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1996年）、《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1997年）、《香港地产业百年》（2001年）、《香港金融业百年》（2002年）、《香港产业结构研究》（2002年）、《百年利丰：从传统商号到现代跨国集团》（2006年）、《香港企业购并经典》（2008年）、《厚生利群：香港保险史（1841—2008）》（2009年）、《百年利丰：跨国集团亚洲再出发（第2版）》（2011年）、《香港：打造全球性金融中心——兼论构建大珠三角金融中心圈》（2012年）、《香港产业结构转型》（2014年）、《香港金融与货币制度》（2015年）及《承先启后：利丰冯氏迈向110周年——一个跨国商贸企业的创新与超越》（2016年）等著作。同时也相继撰写发表了一批相关论文。其中，《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和《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这两本书自出版后一直受到市场的关注，成为了解、研究香港经

济的重要参考书籍之一。在2001年香港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香港三联书店将这两本专著列为公司向市场重点推介的十部著作中的两部。

光阴似箭，岁月飘去又来。一转眼，香港将迎来回归20周年。香港自进入转型时期以来也已跨越了30多年。为此，笔者计划将过去30年来发表的（包括部分尚未发表的）有关香港经济的论文集结成书，定名为“转型时期的香港经济”。全书共分四部分，分别从经济政策与经济转型，财政、货币与金融，资本与财团及粤港合作与广东珠三角发展四个方面，回顾香港过去30多年来的演变和发展，并提出香港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和发展趋势。本书的部分论文有所增删，但笔者尽量保持它们原来的面貌。

第一编“经济政策与经济转型”共收录了9篇论文，包括《香港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香港经济政策趋向分析——兼评“积极不干预”政策》《香港土地管理制度的基本特点及其利弊》等，主要分析了转型时期以来香港经济政策的主要内涵及其转变、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的基本趋势及其存在的问题。根据香港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和现有的产业基础，现阶段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的基本趋势，是迈向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同时巩固和提升其作为国际贸易及物流中心、国际旅游中心和国际创新中心的战略地位，构建“1+3”的产业体系，从而继续保持和提高其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不过，鉴于香港存在不少值得忧虑的深层次问题，香港要成功实现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必须具备三个政策前提：第一，维持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进一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第二，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转变“积极不干预”的思维方式，制定和实施“适度有为”的产业政策，积极推动经济转型；第三，深化与中国内地特别是广东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融合，重建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战略优势。

第二编“财政、货币与金融”共收录了8篇论文，包括《港英政府理财哲学与财政政策的演变与特点》《回归以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政策分析》《论港元联系汇率制》等，主要研究了香港财政政策的演变、港元联系汇率制面对的冲击及其完善、香港金融业的转型发展以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巩固、提升等问题。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香港有可能透过依托亚洲，特别是中国内地经济腹地，逐步发展成为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不过前提是：香港与其经济腹地广东珠三角充分利用中央授予的关于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的权限，以及CEPA在广东“先行先试”等制度安排，突破金融业合作的制度、体制、机制障碍，实现三地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进而形成以香港为龙头，以深圳、广州为主要两翼，以珠三角城市为支点的大珠三角金融中心圈。这一编主要从金融业发展的角度回应第一编中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方

面和方向。

第三编“资本与财团”共收录了7篇论文，包括《论香港英资财团的历史命运》《英资从巅峰滑落的历史背景与原因》《香港华人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等，主要分析转型时期以来香港英资财团势力的削弱及其历史原因，中资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角色及其发展策略，香港华资财团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优劣及其存在问题，香港华人家族企业的传承，以及香港主要华资财团的投资发展策略等问题。从资本与财团的层面反映转型时期以来香港经济的发展演变。

第四编“粤港合作与广东珠三角发展”共收录了8篇论文，包括《珠江三角洲的崛起及其启示》《CEPA 框架下粤港澳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研究》《CEPA：深化粤港金融合作，将广东建成金融强省》等，主要研究在国家改革开放方针下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崛起，粤港经济合作，特别是在CEPA 框架下粤港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合作的重点领域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在国家“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战略下粤港澳合作的新趋势等。从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的层面研究转型时期以来香港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在2007年撰写的《CEPA 在广东实施面对的困境与策略性思考》一文中，我们深入分析了CEPA 实施面临的困境，包括随着WTO 过渡期结束，CEPA 的优先性逐渐减弱；CEPA 开放的全面性与香港中小服务企业进入难度的矛盾；以及市场壁垒与两地服务业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为此，建议“根据CEPA ‘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积极向中央争取政策，使CEPA 对香港的开放在广东先行一步，或者说，以广东为对香港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开放的实验区”；“在CEPA 框架下建立‘广东服务业开放试验区’，可以针对香港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或放宽限制，使更多的香港有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企业进入广东发展”。这些建议现在都已成为现实。

以上是本书的一条基本脉络。本书的出版，首先要衷心感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暨南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衷心感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金山教授、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钟韵教授、暨南大学出版社经济与管理事业部主任曾鑫华编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若没有他们的专业精神和热忱帮助，本书实难以顺利出版。

诚然，由于笔者水平所限，书中可能有不少错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冯邦彦谨识

2017年3月



前 言 / 001

第一编 经济政策与经济转型

- 香港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 002
香港经济政策趋向分析——兼评“积极不干预”政策 / 012
香港土地管理制度的基本特点及其利弊 / 023
香港制造业发展路向与策略 / 030
香港经济的奇迹 / 035
香港经济结构的第二次转型及其影响 / 044
地产“泡沫”对香港经济造成严重隐患 / 054
回归以来香港地产业的发展演变与基本特点 / 059
香港产业结构第三次转型：构建“1+3”产业体系 / 069

第二编 财政、货币与金融

- 港英政府理财哲学与财政政策的演变与特点 / 086
回归以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政策分析 / 093
论港元联系汇率制 / 109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及挑战——简评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策略文件》 / 117
“九七”前后香港经济、金融面临的挑战与风险 / 122
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港元联系汇率制 / 126
香港保险业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与监管制度 / 133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比较优势、差距与战略定位 / 143

第三编 资本与财团

- 论香港英资财团的历史命运 / 156
- 转型时期怡和集团发展动向分析 / 166
- 英资从巅峰滑落的历史背景与原因 / 178
- 香港华人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 / 187
- 中资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角色及其发展策略 / 199
- 百年利丰：基业长青的经营管理之道 / 210
- 从李嘉诚部署交班看华人家族企业的传承 / 224

第四编 粤港合作与广东珠三角发展

- 珠江三角洲的崛起及其启示 / 230
- 粤港合作建立“香港—珠三角高科技湾区” / 240
- CEPA 框架下粤港澳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研究 / 244
- CEPA：深化粤港金融合作，将广东建成金融强省 / 256
- CEPA 在广东实施面对的困境与策略性思考 / 261
- 深化粤港金融合作，加快深穗区域金融中心发展 / 268
- 新时期粤港澳金融合作的重点领域与策略 / 281
- “一带一路”战略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 / 289



第一编 经济政策与经济转型

香港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香港在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开放、改革和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如何充分发挥香港的优势和作用，已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一、中国联结国际市场最重要的枢纽和桥梁

1979年，中国决定在广东实行“特殊改革、灵活措施”，并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等地建立经济特区后，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香港实际上成了中国内地联结国际市场最重要的枢纽和桥梁。

(一) 香港成为中国发展对外贸易最重要的转口港

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经济交往受到阻隔，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仅维持着一般的商品贸易关系，而且主要表现为单向式的贸易往来，即内地向香港输出粮食及原料。即使在这段时期，香港仍是中国大陆主要的出口市场和创汇来源地。

近十年来，两地贸易关系发生了两个显著变化：①香港产品输入内地的数量大幅增长。1978年香港产品输入内地货值仅0.8亿港元，到1987年已增至278.7亿港元；香港产品在内地市场所占比重已从0.2%上升到14.3%，内地已成为香港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市场。②转口贸易大幅增长。1978年内地经港转口贸易值仅36.6亿港元，到1987年已增至842.7亿港元；内地经港转口贸易值在内地输港贸易值中的比重亦由34.5%上升到73.1%。同期，经港输入中国内地的外国转口贸易值从2.1亿港元增至601.7亿港元。中国供应及吸纳的转口贸易值在香港转口贸易值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29.3%上升到79.0%。^①

导致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①近年来中国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由

^① 参阅华润贸易咨询有限公司编印的《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1947—1987）》。

于中国出口产品多属初级产品及中低档制成品，在容量相对细小的香港市场渐趋饱和，除非在产品结构及质量上有所突破，否则难有大的作为；而随着中国内地和香港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出口产品借助香港的国际销售渠道和完善的通信、运输系统及金融服务系统进入国际市场的步伐则大大加快。据统计，1987年中国出口总值中，约1/4是经港转口到其他国际市场的。^① ②香港制造业内移和广东珠三角地区大规模发展来料加工装配业务，使传统贸易方式出现突破性的发展，由单纯的商品贸易形态向资本—技术贸易形态过渡，从港或经港输入内地的设备、原材料和内地加工装配产品经港转口国外市场均大幅增加。据《恒生经济月报》估计，过去几年间香港转口贸易值中，每年平均约有两成来自加工业务。^② ③中国大陆透过香港的中介作用与中国台湾、韩国等的间接贸易急剧发展。据统计，1978—1987年，内地与台湾经香港的转口贸易值从2.2亿港元增至118.2亿港元，约增长了52.7倍。^③ 上述情况表明，香港作为内地传统出口创汇基础的重要性已相对下降，而作为中国内地发展对外贸易的桥头堡和中转站的角色则大大增强。这对于现阶段内地在开放之初信息不灵、市场不明的情况下开拓国际市场，并逐步建立自己的国际销售网络具有重大意义。

（二）香港工业内移推动了沿海开放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香港工业内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近年已达到空前规模。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一份调查报告估计，到1988年上半年，港商在广东省设立的直接投资企业（包括独资、合资、合作经营企业）2400~2700家，雇佣劳工48万~54万人，实际投入资金29亿~32亿美元（截至1988年第三季度）；而在广东省内设置的13000家来料加工装配企业中，约有80%为港商从事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雇佣劳工85万~120万人，实际投入资金超过18亿美元。广东省在1979—1987年间获得的工缴费约20亿美元，仅1987年就达5亿美元。^④ 香港与广东珠三角地区已逐步趋向形成“前店后厂”的分工格局，港商把其总公司，包括采购部、营业部、设计部留在香港，负责筹集资金、海外接单、产品设计、质量管理以及包装、销售等，而把其劳动密集型的工序或生产线移入广东珠三角等沿海开放地区，发挥这些地区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比较优势，使之成为香港巨大的加工生产基地。

① 根据《中国统计月报》1987年第12期资料分析。

② 参阅香港《大众报》1988年6月30日。

③ 参阅华润贸易咨询有限公司编印的《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1947—1987）》。

④ 参阅香港贸易发展局的 *Survey on Hong Kong re-exports-summary report*。

形成这种“前店后厂”的分工格局的基本原因，是两地的比较利益优势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香港有发达的金融体系、充裕的资金来源、广阔的国际市场及反馈灵敏的信息，并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动有很强的适应性，但近年迫于劳工短缺，工资、土地价格上涨的压力，面临产业结构调整，故将其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工序往外转移；广东珠三角地区等沿海地区则资金匮乏、市场狭窄、技术落后、信息不灵，其主要优势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两地的比较利益优势在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和市场机制的诱导下结合起来了。对香港而言，这种结合夯实了它的工业基础，使其在完成自身工业转型之前获得一个喘息时期，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其劳工短缺、成本上涨等困难，增强了香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对内地而言，这种结合一方面解决了沿海开放地区数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使在封闭经济体制下长期闲置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能迅速调动起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使这些地区获得了外汇、资金，引进大量先进或适用的技术和设备，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崛起、经济结构的转换及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目前这种“前店后厂”的分工格局已出现新的动向，即从内地与香港的合作进一步发展为内地、香港、台湾3个地区之间的合作，香港的中介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据统计数据显示，台湾北部已有45%以上的鞋厂通过香港转移到大陆设厂。1988年台商到福建投资设厂的项目和资金数额都大幅增长，超过以往8年的总和。香港—珠江三角洲的合作模式将通过香港的中介作用，发展为台湾—福建的合作模式，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所谓“中国经济圈”的构想，实际上正是对这种经济关系的前瞻或理想化。

（三）香港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重要渠道

近年来，随着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与经济分工的迅速发展，香港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最重要的渠道，表现在：

（1）香港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投资者。据中国经贸部统计，截至1987年，在全国批准的10 008家外商投资企业中，港澳地区有8 570多家，约占85.6%；利用外资协议金额219.6亿美元，港澳地区达142.6亿美元，约占64.9%；实际使用金额85亿美元，港澳地区达43亿美元，约占50.6%。^①

^① 参阅1998年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2) 香港金融机构对内地非银行客户的放贷额急剧增加,从1979年底累计放贷额1亿多港元,增至1987年的232亿港元。^①

(3) 香港作为亚太地区银团贷款中心,成为内地大型项目的集资场所。据统计,仅1984—1987年7月,香港为内地安排的银团贷款就达262.1亿港元。^②

(4) 香港证券市场开始成为内地集资的重要场所,以债券形式的集资活动已经起步,从长远看,内地大企业及驻港中资企业在香港股票市场上集资也具有潜在的发展前景。

此外,双方在交通运输、通信、旅游以及信息等方面的合作也获得全面发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反过来亦增强了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香港成了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重要跳板。

二、对内地经济体制改革的示范效应和催化作用

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和双方人员的密切交流,香港作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典型,作为现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法制相对完备的社区,对中国,特别是广东以及沿海开放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示范效应和催化作用逐渐显著。目前这种作用正从两个方面逐步展开:

(一) 随着外资引进而产生的日益增长的市场经济因素对原有传统经济模式的冲击和渗透

从一定意义上说,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经济活动,包括独资、合资、合作经营、补偿贸易和来料加工装配,是国际上特别是香港的现代商品经济的延伸和附属,它客观上要求按市场经济的规律运作,这就相应地带进了国际上久已形成的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国际惯例、企业管理制度以及市场竞争的压力。这部分因外资引进而形成的经济活动尽管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微不足道,但由于它相对集中在沿海开放地区,特别是包括深圳、珠海、广州的珠三角,这就大大增加了该地区市场经济的因素。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清晰的产权关系、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高效率,对当地正在发展中的、机制相对灵活的乡镇企业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且这些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以乡镇企业为合作、合资、发展来料加工装配业务的对象,给乡镇企业带来其所急需的外汇、设备、技术和市场,

^① 参阅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编的《港澳经济季刊》1988年第2期。

^② 参阅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编的《港澳经济季刊》1987年第4期。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进而改变该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壮大了市场经济的力量。据调查，1978—1987年，珠三角地区的东莞、中山、顺德、南海四市县的财政收入中，来自国有企业的比重已从60.4%下降到24.3%，来自乡镇企业的比重则从38.6%上升到52.5%。^①乡镇企业在该地区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急速上升，迫使国有企业处于不改革就难以发展的境地。“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原有的产品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更不相适应，并从中发育起劳动力市场、外汇市场、资金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技术市场以及信息市场等，尽管这些发展是初步的，甚至是原始的，但它们对经济改革的影响实在不容忽视。^②

更重要的是，对外开放促进了社会观念的更新。开放之初，蛇口工业区竖起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幅标语，在全国影响深远。随着对外开放实践的发展，作为现代商品经济观念的效益观念、市场观念、商誉观念、人才观念以至法治观念都对沿海开放地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一大批农民、市民成长为熟知现代商品经济和了解国际行情的企业家。这就为整个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香港对中国内地发展现代商品经济的借鉴作用

香港对中国内地发展现代商品经济的借鉴作用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香港作为现代商品经济的一种特殊模式，即开放型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对中国沿海开放地区，特别是深圳、海南等经济特区的借鉴作用；二是香港模式所体现的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和运作机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借鉴、启迪作用。目前，这种借鉴主要在第一层次上展开。“二战”后的40余年间，香港在资源短缺、地域窄小的情况下，从南中国的一个转口港迅速发展为新兴工业地区、亚太重要的金融贸易中心，1987年人均GNP达到8200美元。香港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使得它的自由港模式及其经济发展经验对深圳经济特区模式的形成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又从深圳扩展到珠三角地区以至沿海开放地带。“特区不特”，这固然是指全国产品经济体制对特区的制约，但亦反映出，特区所实施的特殊政策被迅速移植、推广到沿海开放地区，大大加快了沿海经济改革的步伐。

目前，沿海地区对香港的借鉴正从多方面展开：政治上，借鉴香港公

① 根据笔者到珠三角地区实地调查的数据整理。

② 杨振汉，冯邦彦，梁秩森。珠江三角洲的崛起及其启示 [J]. 经济导报，1988（16-17）。

务员制度和廉政公署经验；经济上，借鉴香港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以及土地拍卖、股票上市、证券发行、公共建设等方面的制度和管理经验；法律上，对经济法律的研究、移植亦已起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对香港的借鉴已从个别经济发展经验转向整体模式，这突出表现在海南建省的过程中。实际上，新建的海南省亦正向着自由经济区模式发展，即将制定的海南特区税制、股票条例、债券条例、卖地细则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香港现行法则。当然，这种借鉴在理论上仍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自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理论界展开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探讨后，在第二层次上对香港的借鉴也已经起步。最近，厉以宁教授在香港就指出：“总结香港经济发展的经验，把这些经验作为全中国人的共同财富，使它们有助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展，有助于中国的经济繁荣，我想，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更应该是内地与香港经济界人士的一种责任。”^①可见，香港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已日益显露。当然，由于内地与香港经济规模差异很大，经济成长的背景、条件各不相同，对香港的借鉴不可能全盘照搬。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香港与内地经济的紧密联系和双方人员的频繁交往，再加上在香港存在着具备一定规模的中资集团，香港已成为现阶段中国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研究及借鉴国际上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规律和运作机制的最重要窗口。

一方面是通过香港进入的市场经济因素不断增长，对原有产品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另一方面是沿海开放地区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借鉴国际上特别是香港的经济发展经验，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造。这两方面作用的结合大大加快了沿海开放地区经济改革的进度，这突出表现在广东珠三角地区。这种以开放为契机，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逐层推进的区域改革思路，有助于克服全国改革中不顾地区差别“一刀切”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减少改革的难度和风险。1988年，中央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其实质是要进一步加快沿海地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其与国际上现代商品经济体制相衔接，以便进一步实现各种生产资源和要素的合理配置。因此，香港在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

三、进一步发挥香港优势和作用的几个问题

要充分发挥香港的优势及其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当前应

^① 厉以宁：论香港的繁荣和香港的经验 [N]，信报，1989-01-27。

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加强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过程中的协调，进一步夯实双方经济合作的基础

现阶段，香港与内地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法律系统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即使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两地经济成长的相对独立性和经济体制的差异仍将长期存在。因此，两地经济关系越密切，越需加强双方的协调和衔接，以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矛盾。目前，两地经济关系中，互补性是主导方面，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不过，两地出口产品的结构大体相近，都以轻纺、电子产品为主，只是双方产品的档次不同，竞争还不是很激烈。随着沿海开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两地间的竞争会日益加剧，从而削弱两地合作的基础。因此，当前亟须从长远发展角度，分析两地经济发展的相对优势和劣势，制定出两地的长期发展战略，协调两地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发展，以便有效地利用两地各自的优势，增强互补性，避免恶性竞争，夯实两地经济合作的基础，提高两地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水平。具体而言：

第一，进一步加强香港的贸易转口港地位。有人担心，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及与国际市场联系的逐步密切，香港作为中国对外贸易转口港的地位将会被削弱。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此，中国在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中，对香港的作用应有正确的估计。笔者认为，即使从中长期看，香港贸易转口港地位不仅不应削弱，相反应进一步加强。理由是：①目前中国出口总额中，对香港出口及转口部分占1/3以上，香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②香港完善的通信运输系统、与国际市场传统的紧密联系、大批的工商管理人才是中国开拓国际市场最有利的条件；③香港在中国与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地区的间接贸易中的中介作用不可替代。因此，从战略上看，中国应充分利用香港优势，透过香港逐步建立开拓国际市场的销售渠道、网络及市场信息反馈系统，各省外贸系统应研究如何与本省驻港中资企业在体制和业务等方面加强衔接，解决好利益分配问题，逐步形成集团经营，进而发展为跨国公司。此外，随着内地和香港经济关系的急速发展，两地间的交通运输能力已渐趋饱和，有时甚至出现超负荷状态，文锦渡口岸更成为“瓶颈”，这方面也需加强总体协调。

第二，加强两地的科技合作。目前两地工业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来料加工装配。这种形式对促进两地的经济合作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不应长期停留在这一水平上。从长远看，它无助于推